

理性与浪漫

王中江/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学

作为一个哲学家，金岳霖是高度理性化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使哲学活动变成了类似于科学家的纯客观性操作。

作为一个人，金岳霖则是极其个性化的，其生活充满浪漫色彩，纵其性灵，超脱达观，雅人深致，自成高格。

理性[]浪漫

——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学

王中江/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1 号

理性与浪漫

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学

王中江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省通许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245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215-02646-9/B·80

定 价 11.00 元

内 容 提 要

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金岳霖都是 20 世纪中国的大哲学家之一。他的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不仅导入了西方哲学的取向,而且试图复兴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是中西两种哲学遗产的重构。他的一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代,感受过各种各样的生活,其追求,其选择,既有时代的印记,又有个人的情调。本书就是以这两方面为基本参数,展开了对金岳霖的全面阐释和具体刻画。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十分注意对金岳霖以下两个特性的把握:即作为一个哲学家,金岳霖是高度理性化的。在很大程度上,他排除了个人情感的浸入,使哲学活动变成类似于科学家的纯客观性的操作。他对知识论的建构,对逻辑的倾注,都体现了把哲学带进科学化和技术化的试验。他对他的“道”形上学,尽管有使其满足感情的要求,但面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情事实和宇宙法则,他仍保持着冷静的目光。而作为一个人,金岳霖则是极其个性化的,其生活充满浪漫色彩。他纵其性灵,追求自己的情趣;超脱达观,不为俗事牵;雅人深致,自成高格。

序

金岳霖先生是中国现代久负盛誉的哲学家、逻辑学家，是中国现代分析哲学的宗师。早在 20 年代，金先生发表了《论外在关系》、《论自相矛盾》等缜密分析的论文，受到学术界的称赞。同时代的哲学家张申府曾著文说，“在中国的哲学界，以金岳霖先生为第一人”。（见张申府所著《所思》的原版附录）到 30 年代，金先生出版了逻辑学专著《逻辑》，论述了数理逻辑，是一部关于逻辑的名著。30 年代，金先生著《论道》，提出了自己的本体论体系。到 40 年代，又著《知识论》，提出了自己的认识论体系。这些哲学专著的基本观点接近于英国哲学家穆尔（G·E·Moore）及罗素（B·Russell）的新实在论，都是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写成的，其分析之精、论证之细，在中国可谓前无古人，都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金先生的分析方法是来自西方的，但是在哲学态度上亦深受中国传统哲学的熏陶。《论道》的《绪论》说：“每一文化区有它底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底最崇高的概念，……现在这世界底大文化区只有三个：一是印度，一是希腊，一是中国。……中国底中坚思想似乎儒道墨兼而有之。……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我的情感难免以役于这样的道为安，我底思想也难免以达于这样的道为得。”他的本体论以道为最高范畴，所以题为“论道”，这表现了金先生的思想倾向。从这个意

义来说,金岳霖先生的哲学也可以说是融会中西的哲学。

新中国成立以后,金先生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上有深刻的转变,由新实在论转向辩证唯物论。金先生的思想转变是真诚的转变。20年代,金先生在清华大学创办哲学系,担任哲学系主任,后来冯友兰先生到清华任教,金先生即将哲学系主任职务交给冯先生。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全国各大学的哲学系都合并到北京大学,金先生受聘为北大的哲学系主任,于是金先生一改不耐烦做事务工作的习惯,每天都到哲学系办公室办公,其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敬佩。1955年金先生调到中国科学院,与潘梓年同志共同筹建哲学研究所,担任全国的哲学逻辑学研究的领导工作,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金先生在哲学上习惯于抽象思维,在生活上却也有多方面的兴趣,和许多知名的文学家有交往。金先生待人非常谦和,能兼容不同的意见,因而能广泛团结哲学界及逻辑学界的各方面的研究者。金岳霖先生以其深湛的思想与谦虚的态度受到社会上多方面人士的敬仰。金先生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一生,是为文化学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一生。

王中江同志多年以来细心钻研金岳霖先生的著作,并遍访金先生的生前友好,以数年之力,写成《理性与浪漫——金先生的生活及其哲学》一书,这是一部学术史力作,搜集了广博的材料,进行了比较深切的分析,这是值得赞许的。中江同志征序于余,于是略陈对于金先生的印象,以为之序。

1993年6月

自序

读大学时，我所知道的金岳霖先生，不过是他主编了《形式逻辑》而已。后来到北大念研究生，要作毕业论文，先是导师建议做杨昌济的思想研究，觉得虽不是不可以做，但总嫌杨作为一位哲学家似乎不足，于是就不自量力地向导师言：“希望选一位思维复杂，有哲学体系的大哲学家考察一下。”最后定为金岳霖先生的哲学思想研究。这样以来，我就必须真正接近金先生，盘垣其侧，与之周旋。语曰：万事开头难。一旦为之，随有力不从心之感。但又不愿中断，轻易罢休，只好硬着头皮作下去。把金先生的著作论文都弄来，一一读之。当其初，心中真如一团乱麻，飘然无根，所谓剪不断，理还乱，堕烟海，不知指归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黄梨洲言：“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手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之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杜牧之曰：‘丸之走盘，横斜圆直，不可尽知，知是盘丸不能出于盘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我所以惑乱不解，即在于不得金先生哲学的“道”和“宗旨”。为解其谜，我力求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原始返终，结果慢慢总算有所明白。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说的“思之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将通之”吧。

金先生的哲学体系是围绕着一个什么根本问题展开的呢？或者说他究竟是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以为是“普遍和特殊”或“共相和殊相”的关系。这是一个诱人的哲学史上老而不衰的问题。金先生在这问题上的主见，是强调二者的不同和差异，以及何以不同和怎么不同。这在他的《知识论》中尤为明显，而其中的“意念”(Idea)是为关键。我最后作出了《金岳霖知识论中的意念论之分析》的硕士毕业论文(此文压缩后发表在《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三集上)，并顺利地通过了答辩。金先生的学生，作为答辩委员之一的周礼全先生，给我以鼓励。冯友兰先生知此后也说：“你很了不起，金先生的书我就不太读懂。”当然冯先生是谦虚的表现，而我只不过是浅尝辄止罢了。

1986年，我开始跟着张岱年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并有幸赴东京大学研究进修一年，这促使我对中日思想作一点比较性的考察，完成了《严复与福泽谕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于1989年夏通过了答辩。

这样我就有了一个重操旧业的机会。我希望写出一部全面把握金先生的著作，不只是他的知识论，还包括他的形而上学和逻辑学；不只局限于他的哲学，还有他的人生一面。这既向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出现了新的困难。对金先生哲学的整体把握虽难，但至少没有文献不足的问题。而在他的人生侧面，材料缺乏的问题就格外突出。首先是金先生本人留下的第一手生活资料非常有限，他晚年要写的自传虽最终写出了，但不系统，而且也没有完全发表。同时金先生的同事和学生回忆的第二手素材也很少。这样，我不得不扮演一个类似于采访者的角色，去了解金先生的生活事迹。我先后访问了冯友兰、王宪钧、张岱年、周礼全、陈岱荪、吴组缃、任华、朱伯昆、刘培育和金鼎汉(金先生的侄子)等先生。他们在

年事甚高或工作繁忙之际，都能接受我的请求，向我讲述了他们所闻所见的有关金先生的一切，这是我非常感激的。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我写出了这部书稿，这可以说是我前后两个期间断断续续研究金先生的一个结果，要问这个结果有什么意义的话，我想说它应该是全面研究金先生的开始，当然我希望这是一个不坏的开始。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张岱年先生不断地给我以鼓励，虽然他不一定都同意书中的观点，但他一有机会就催促我尽快完成出版，并欣然为此书赐序。金岳霖学术基金会秘书长刘培育先生，给了我具体的帮助和支持。他把金岳霖回忆录（部分）的整理稿，提供给我，让我参考，并应允把它作为本书的附录之一，使我在书稿已完成尚未出版之际，能对书稿作出某些修正和补充，同时使读者在披览此书时也能直接欣赏金先生那富有幽默感和妙趣横生的文笔。作为本书附录之三的《金岳霖学术纪年》，刘先生也多有示教。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煜先生，惠阅了部分书稿，匡正良多。河南人民出版社也鼎力支持本书的出版。对以上这些盛情雅意，在此我表示由衷的感谢。

1993年2月

导 论

随着近代的开国,中国古典(或传统)哲学,开始逐渐沿着新的道路向前发展。首先是新的因素——西方哲学缓缓东渐,出现了象严复、梁启超和王国维这种传输介绍西方哲学的彗星人物,诱发出中西哲学的矛盾冲突以及使二者融会结合的初步试验。这一过程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明显地加快了。对西方哲学的输入,是吞吐式的,大量而又广泛,形成了西方有多少主义,中国就有多少地盘的多元局面。西方哲学的冲击和刺激,也引起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重新认识和再检视,以回答它何去何从的紧迫问题。中西哲学接触及其会合,迎来了中国哲学的新气象。对此冯友兰先生曾作过如下的描述。他说:“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局面尽管看来混乱,可是中国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哲学思维,却有了伟大的进步,这并不出人意外。中国的混乱,是中国社会性质由中世纪向现代转变的一个方面。在这场转变中,造成了新旧生活方式之间的真空,传统的生活方式已经废弃,新的生活方式仍然有待于接受。这样的真空,十分不便于实际日常生活,但是很有利于哲学,哲学总是繁荣于没有教条或成规约束的人类精神自由运动的时代。”

.....

在中国现在进行的转变中,哲学家们特别幸运,因为自本世纪初以来,他们重新审查的、估价的对象,不仅有他们自己的过去的

观念、理想,而且有西方的过去和现在的观念、理想。欧洲、亚洲各个伟大的心灵所曾提出的体系,现在都从新角度,在新的光辉照耀下,加以观察和理解。随着哲学中新兴趣的兴起,老兴趣也复兴了。在这种形势下,如果当代中国思想竟无伟大的变革,倒是非常奇怪了。”^①

活跃在哲学天地的大都为职业哲学家,他们是新型知识分子,不务外,不越分,一身一任,在学问和思想领域安身立命。他们从学问饥渴,求知欲旺盛,到创造性冲动,经历了连续不断的积累过程。他们的精神张力和能量唯哲学是从,深深致力于哲学的创作和体系的建构之中。

在中西哲学深入广泛交流的大背景下,中国现代哲学家的哲学面目似乎都是二重化的。从正面说,它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延续,又是西方哲学精神的反射。在它那里,我们既能看到传统东西的再现,又能感知西方事物的气息。从反面说,它已不是完全传统的,也不是纯西方的。无论它多么传统化,它已染上了西方的色彩而不再是原色,不管它怎样西化,它总是与传统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种二重化性格,不仅未分于未出国门一步的哲人及其体系,而且未分于远涉重洋求学西方的智者 and 他们的哲学建构。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情形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他们会在一个侧面突显些而在另一个侧面淡些弱些。这样,他们就有了下面的不同。有的是扎根于中国传统哲学,以通过新的观照和解释使它再现活力;有的是中西贯通,关注二者的比较和相互理解和相互阐明,寻求人类的普遍价值和特殊取向,使其互补互认;有的是立足于西方哲学,精心研究,自用思想,于其深切著明处,谋求超拔性的见解,以对哲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载《哲学研究》1987年第6期。

学有所贡献。如果要举出能体现前两个特点的哲学家,可以推出熊十力和冯友兰先生分别作为代表,而要举出一位能充分表现出第三个特点的哲学家,金岳霖先生是再合适不过了。

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哲学家追求为学和做人的统一,哲学和政治的有机结合,伦理道德和人生的优位。儒家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主体最清楚地表现出这一特性。孔子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①充分表明了他的哲学和他的生活、求知和安身立命的连续性。而且他和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一样,决不是学院和书斋中的哲学家,只是提出哲学理想,他还要把它化为具体的政治实践,尽管这条道路并不平坦,但他仍深信执著,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在孔子那里,求真、从善、美感,息息相关,没有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由孔子奠基的哲学,后一直成为中国哲学持续进展的一条重要的源头活水。孟子无疑是沿着孔子开创的哲学道路前进的。他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②“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③“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④“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⑤等,都明显地把世界认知,人格境界,社会投入,政治理想,不可分地结合了起来。张载的“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

① 《论语·为政》。

②③ 《孟子·尽心》。

④ 《孟子·公孙丑》。

⑤ 《孟子·滕文公》。

为来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更体现了中国哲人集多种品性于一身的特点，可以说是统括了中国哲学家的全部追求。此外，为人熟知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内圣外王之道”，“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等等说法，也都反映了中国哲学的整体取向和终极关怀。

中国哲学的上述特性，无疑有其美妙动人之处和它的独特价值。但既有得和益，就不免有失和损。这就是，学课的分化和专门化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思想概念惊人的模糊而不明确；自然探求精神薄弱，自然科学一直处于较低的阶段上；对知识论和逻辑方法的价值重视不够，因而在这两个领域建树不多。但西方哲学则在这些方面大放异彩，显示出与中国哲学不同的特性。在它那里，科学知识达到了高度的分化和专门化；分门别类的研究在亚里斯多德那里就得到了充分的自觉；知识论，逻辑学，受到了哲学家们的关注，从近代以后尤其如此。与此相关，科学思想和科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如果用最简略的几个字来表示中西哲学的不同特性，可以说中国哲学侧重于“尊德”，西方哲学侧重于“爱智”（当然不能误解为西方哲学不讲德，中国哲学没有智）。

随着西方哲学的东渐，中西哲学的对照和比较成为可能。西方哲学的优点，如科学方法逻辑学和科学思想首先受到注意。明代以西方传教士东来传教为契机，李之藻等人就译出了《名理探》。到了近代，对西方科学思想、逻辑学的介绍和研究兴趣明显地增长了，因为它不仅能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而且还会给国家带来富强。严复和梁启超是突出的代表。他们都共同强烈地表现出对西方哲学知识论、科学方法的重视。在严译的八部书中，其中两部就是逻辑学著作。他不厌其烦地强调它们的重要，批评中国古典哲学

在此领域的荒芜。关于科学,严也作了一系列论述,高度评价科学的作用。与严相似,梁对科学的本性,科学的功能进行了阐发,分析了中国传统观念中抑制科学发展的诸因素。人们对墨学也开始重视起来。胡适作为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传输上述西方哲学精神和价值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与此不同,有一些人则致力于中国传统哲学精神和价值的复兴。这样,“爱智”(主智主义)和“尊德”(道德主义)这两个方面就共同成为中国近现代哲学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而并驾齐驱。

金先生对中国传统哲学,有很深的造诣,同时又精心研究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近现代哲学,这就使他能够对中西哲学的特性作出恰如其分的说明。我们在他写的《中国哲学》一文中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金先生指出,中国哲学的基本特性和倾向是追求“天人合一”。最高、最广义上的“天人合一”,是我与非我、主体和客体相互融合,统一不二。由于中国哲学家,把哲学与生活、哲学与政治、哲学与社会视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系统,因而“天人合一”也是伦理与政治的统一、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他说:“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在他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自己的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他的事业就是继续不断地把自己修养到进于无我的纯净境界,从而与宇宙合而为一。这个修养过程显然是不能中断的,因为一中断就意味着自我抬头,失掉宇宙。因此,在认识上,他永远在探索;在意愿上,则永远在行动或试图行动。这两方面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在他身上你可以综合起来看到那本来意义的‘哲学家’。他同苏格拉底一样,跟他的哲学不讲办公时间。他也不是一个深居简出、端坐在生活以外的哲学家。

在他那里，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中的一个信条体系，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说是他的自传。”与此相关，中国哲学则不具有发达的知识论和逻辑意识。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哲学不合逻辑，中国哲学不以认识为基础，也不是说中国哲学没有这种意识。缺乏发达的知识论和逻辑意识，仍可以把自己的思想安排得合乎逻辑，进行实际上的认识。只是所表达思想和理论形式显得芜杂不连贯，缺乏系统性和严密性。中国哲学对逻辑学和认识论也有某种程度的认识。只是这种意识在先秦“一开始虽美妙，毕竟过早地夭折了。逻辑、认识论的意识仍然不发达，几乎一直到现在。”而这就成了科学在中国没有出现的部分原因。而西方哲学在整体上则是强调“天人相分”，使我与非我、主体和客体的界限分明，并以获得后者对前者的统治为最终取向。这很有利于知识论、科学和科学方法逻辑学的发展。事实上，这种发展达到了惊人程度，成为西方哲学的突出特点。在西方虽有古希腊苏格拉底这位集哲学、生活、伦理、政治和认识于一身的人物，但西方哲学往后的发展，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人物，尽管有人希望和追求。西方哲学自近世以后，各个部门的分化愈来愈专门化和精细化，要求建立不同知识部门统一的体系，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哲学家的哲学同他的生活，哲学同政治和社会的关系都切断了。“这样做，哲学家就或多或少超脱了自己的哲学。他推理、论证，但是并不传道。除了分工以外，这种超脱的倾向使他成为超脱的逻辑家、超脱的认识论者，或者超脱的形而上学家。往日的哲学家从来不是专职的。职业哲学家的出现可以对哲学有些好处，但是对哲学似乎也有所损伤。他讲哲学，却不用哲学。”不过从另一方面看，“采用这种方法之后，哲学也有所得。我们对每个哲学部门的问题比以前知道得多了。虽然还不能把哲学家的性格与他的哲学完全分开，

毕竟为客观性打下了一个基础,使哲学比以前更能接受积累。其所以在这一方面有所进步,是由于表达工具有了改进,思路得以分明的技术发达了,这是不容忽视的。”

金对中西哲学有如此的把握,同时又处在中国哲学发展的新方向上。那么他的努力目标是什么呢?按照他对中西哲学的比较,他似乎应走综合的道路,建立一个能全面反映中西哲学特性的哲学体系,但一般来说他并没有这样做。尽管中国哲学的风格和特性吸引着他,他也很欣赏它,留恋它;尽管他对苏格拉底式人物的失去、对现代西方哲学家超脱于自己的哲学感到可惜和遗憾。但正如他自始至终都喜爱分析一样,金在哲学体系的构造上,也采取了分的形式,不仅中国传统中文史哲不分家在他那里分开了,而且就是哲学本身也被他严格分成几个部门。他首先选择了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现代哲学的路子 and 取向。他深深投入到西方发达的知识论和逻辑学世界中,出神入化,欲以人之长,补己之短,改变中国知识论和逻辑学的不发达状况。但走这条道路并不容易,金先生说这首先需要一种训练有素的超脱法和外化法,同时,“哲学一超脱,就成了一条迂回曲折的崎岖道路,布满技术性的问题,掌握它需要时间,需要训练,需要学究式的专一,在全部掌握之前往往会迷失方向,或者半途而废。”而这金先生经过努力都达到了。

在金先生沿着他的这一目标前进的过程中,他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把哲学与个人的生活完全割断了。他认为:哲学是哲学,生活是生活,哲学与生活没有关系,哲学是概念的游戏。他受罗素所代表的分析哲学和数理逻辑哲学的影响,沉浸于纯技术化的哲学中,留连忘返。当有人问他为什么弄这枯燥无味的逻辑学时,他的回答是:我觉得这东西很好玩。他面对一群冷冰冰的概念符号,冷静地不动声色地对它们进行一层又一层的分析,就象物理学家

不懈地分解物质的构成元素那样。他似乎把哲学变成了不夹杂任何个人感情色彩的纯理性活动，自外于对象，客观地审视，控制自我的浸入。他的洋洋巨著《知识论》，就是他把哲学客观理性化和技术化的最集中体现。这部书的中心旨趣，是探求知识究竟何以可能，知识的理论基础和如何理解知识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因而从知识论，从逻辑学来说，金先生的哲学精神充分反映的是现代西方的哲学精神，他之作为中国现代哲学家更接近于西方哲学家的现代意义。

但是，一转到金的形而上学，情形就有所不同。在《论道》中，金明显是试图把中西哲学结合起来，并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金说：“中国思想我也没有研究过，但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于不知不觉之中，也许得到了一点子中国思想底意味与顺于此意味的情感。”^①看一看金的“道”，似乎就能说明问题。金指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最基本的原动力，是“道”。道是个极顶字，察其微，道无所不在。行止语默，为学修身，治事立业，莫不有道；观其大，道乃天地之根，万物之宗，理想之极。就是这个道，自古迄今，为人敬仰不已，笃志以求。“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思想与感情两方面的最基本原动力似乎也是道。成仁赴义都是行道；凡非迫于势而又求心之所安而为之，或不得已而为之，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无论其直接目的是仁是义，或是孝是忠，而间接的目的综是行道。……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②抓住了“道”，也就抓住了中国

^{①②} 《论道·绪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